



# 经济与文化





# 论拉唐犹太人及其入唐贸易路线\*

李大伟

## 一、《道里邦国志》所记拉唐犹太商人

公元9世纪中叶阿拉伯史地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urdāhbeh, 820/825—912）在《道里邦国志》中记载了入华贸易的拉唐（Rādhānites）犹太商人，这是迄今所知最早关于犹太人入华的文献记载。1865年《道里邦国志》被刊布之后，诸多学者注意及此，兹转录拉唐犹太商人篇章如下：<sup>[1]</sup>

拉唐犹太商人讲阿拉伯语、波斯语、罗马语、法兰克语、安达卢西亚语与斯拉夫语，经海路或陆路奔走在东西方。从西方贩来阉人、婢女、婴童、织锦、河狸皮、貂皮等皮革与宝剑。从西海法兰克起航至凡莱玛，卸货后以骆驼驮运经25法尔萨赫至古勒祖姆，再从东海乘船经古勒祖姆、达伽尔、吉达，航行至信德、印度与中国。从中国带回麝香、沉香、樟脑、肉桂及其他东方国家货物，到达古勒祖姆、凡莱玛。有些经西海至君士坦丁堡，将货物卖给罗马人；有些经西海至法兰克；有些经法兰克至安条克，陆行三天至伽比亚，航行至幼发拉底河、巴格达；再从底格里斯河至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唐代犹太人入华研究”（项目编号：19YJC770019）、中央高校科研基金项目“唐代犹太人入华研究”（项目编号：18SZYB05）、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代犹太人丝绸之路贸易与入华研究”（项目编号：2018H03）阶段性研究成果。

[1] 拉唐犹太商人篇章，详见Moshe Gil, “The Rādhānite and the Land of Rādhān”, in *th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XVII, No. 3, 1974, pp. 299-328; L. Rabinowit, “The Route of the Radanites”, in *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Vol. 35, pp. 251-280; Solomon Katz, *The Jews in the Visigothic and Frankish Kingdoms of Spain and Gaul*, the Mediaeval Academy of Americ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37, p. 134.

乌布拉，最后航行至阿曼、信德、印度与中国，所有道路都彼此联通。<sup>[1]</sup>

还有很多路线经过陆路。从西班牙或法兰克出发至苏斯·阿克萨、丹吉尔、凯鲁万与埃及首都；再至拉姆拉、大马士革、库法、巴格达与巴士拉，穿过阿瓦士、法尔斯、克尔曼至信德、印度与中国。有时也行至罗马后部，通过斯拉夫之地到达可萨首府海姆利杰，再至里海到达巴里黑，越过河中地区至九姓乌古斯驻地，最终至中国。<sup>[2]</sup>

在拉唐犹太商人篇章译介过程中，对其中一些地区与物资有着不同认识。如所罗门·卡茨（Solomon Katz）、德·胡耶（De Goeje）与拉比诺维茨（L. Rabinowitz）等认为拉唐犹太商人到达法兰克贸易，讲法兰克语；摩西·吉尔（Moshe Gil）则认为非指法兰克，应为弗兰加（Firanja）——中世纪阿拉伯史学家伊斯塔克尔（Al-Istakhrī）、伊本·豪卡尔（Ibn Hawqal）曾言及：“弗兰加与西西里临近，举目可望。”摩西·吉尔据此认为弗兰加应为法兰克王朝统治下的意大利某地，并非法兰克本土。如若考虑到此时阿拉伯帝国与法兰克王国之间在地中海的冲突，拉唐犹太商人也有可能是前往弗兰加贸易，因为该地远离法兰克王国本土。在贸易物资中，所罗门·卡茨等认为包括阉人、婢女、变童、锦缎、河狸皮、貂皮等皮革以及宝剑等。摩西·吉尔认为其中的“河狸皮、貂皮等皮革”，应是阿拉伯史学家伊本·阿西尔（Ibn al-Athīr）所记以羊毛或其他皮毛与丝绸混合加工的衣物——此衣物被称为卡茨（Khazz），并非皮革<sup>[3]</sup>。

公元900年阿拉伯史地学家伊本·法基赫（Ibn al-Faqih）《地理志》中对拉唐犹太人商人亦有所记。《地理志》原书已佚失，其记载可从1022年阿里·哈桑·沙扎尔（Ali b. Hassan al-Shaizari）的摘录中略见一斑，兹转录如下：

这些商人经海路奔走在东西方，来自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呼罗珊、可萨及里海的物资云集于刺吉思（Rhages）。他们将织锦、上好丝绸从法

[1] 罗马语指希腊语；西海指地中海，东海为红海；法尔萨赫为波斯距离单位，1法尔萨赫约为5.5千米；凡莱玛、古勒祖姆为尼罗河港口城市；达伽尔、吉达分别为麦地那、麦加港口城市；安条克位于今土耳其南部安塔基亚；伽比亚位于幼发拉底河畔；乌布拉位于波斯湾北端。

[2] 苏斯·阿克萨、丹吉尔位于摩洛哥；凯鲁万位于突尼斯；埃及首都指福斯塔特（Fustat）城——641年阿拉伯人建立首都城福斯塔特，一直沿用至969年。拉姆拉位于今以色列中部；库法位于今伊拉克南部。阿瓦士、法尔斯、克尔曼分别位于今伊朗西南、南部与东南。可萨为历史上北高加索地区部族，首府为海姆利杰；巴里黑，即今阿富汗北部巴尔赫城；九姓乌古斯，即汉籍所记九姓回鹘。

[3] Moshe Gil, "The Rādhānite and the Land of Rādhān", p. 307.

兰克带到凡莱玛，再经海路至古勒祖母，并携带所有物资至中国；然后将肉桂、白屈菜等中国物资从海路运至古勒祖母、凡莱玛。这些犹太商人被称为Rāhdānīs，讲波斯语、希腊语、阿拉伯语及法兰克语，从凡莱玛出发，贩卖麝香、芦荟、木材及与法兰克国王相关的东西，随后到达安条克，又至巴格达、乌布拉。<sup>[1]</sup>

伊本·法基赫的记载没有超出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记范围。不同的是他将拉唐犹太商人记作Rāhdānīs，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作Rādhānites——在叙利亚文书写中，尤其是专有名词，经常在r之后加h，如Rūmī被写成Rhūmī，Rādhānites在Rā音之后插入h音，成为Rāhdānīs，因此他应是受叙利亚文书写的影响<sup>[2]</sup>。另外，伊本·法基赫记载各地物资云集刺吉思。位于波斯境内的刺吉思为通往中亚必经之地，交通贸易发达，伊本·法基赫家乡杰贝勒省哈马丹紧邻刺吉思，他应是为凸显该地交通贸易的重要性而记之，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对东方的行程记载简略，未能一一注明所经诸地。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作为古典阿拉伯地理学鼻祖，所著《道里邦国志》常被后世阿拉伯史地学家参考、因袭，因此伊本·法基赫应是因袭了他对拉唐犹太商人的记载，并改变了一些内容。

## 二、拉唐犹太商人西欧说之非

自拉唐犹太商人篇章刊布以来，关于Rādhānites的意义众说纷纭，如有拉比（Rabbi）、行商、布商、信使、Rayy（刺吉思）、Rhone（罗纳河）等解释，但都充满争议，难以成立<sup>[3]</sup>。德·胡耶与戈伊泰因（Goitein）等笼统地认为9世纪东方犹太人不具备长途贸易的条件，法兰克王国贸易环境优越，其地犹太人熟悉长途贸易，因此拉唐犹太商人来自法兰克王国。

中世纪法兰克王国犹太人只有在得到国王、主教与地方首领赐予的特许状之后才能经营贸易。特许状对犹太人在法兰克王国享有的土地、贸易及借贷等权限，都做出了明确规定。迄今所知，法兰克犹太人9世纪之前获取的特许状仅

[1] L. Rabinowitz, *Jewish Merchant Adventures: a Study of the Radanites*, p. 198.

[2] Moshe Gil, "The Rādhānite and the Land of Rādhān", pp. 306-307, p. 315.

[3] 这些说法多是从对音或对Rādhānites意义的猜测而形成，并没有依赖可靠的文献或被证实，详见L. Rabinowitz, *Jewish Merchant Adventures: a Study of the Radanites*, pp.108-109; Moshe Gil, "The Rādhānite and the Land of Rādhān", pp. 300-305.

有6件，10世纪中叶之后才大量获取。《道里邦国志》完成于9世纪中叶，如若拉唐犹太商人来自法兰克王国，法兰克国王将特许状赐予如此大规模的犹太商人群体势必会被史籍所载，但在西方史籍中从未见到关于此之记载。

中世纪早期（6—10世纪），法兰克王国与东方的联系多集中在地中海周边。8世纪初至9世纪末，据法兰克使节、朝圣者前往东方诸地行程而论，法兰克通往东方的道路主要包括：一是从罗纳河至马赛，航行至意大利半岛，后经爱奥尼亚海、希腊至爱琴海，再经塞浦路斯至叙利亚、巴勒斯坦；二是从意大利到北非，再至中东各地；三是通过亚德里亚海至拜占庭、阿拉伯；四是经亚得里亚海或爱奥尼亚海至科林斯，再至君士坦丁堡；五是经多瑙河至保加利亚，最后至拜占庭；六是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经波罗的海、瓦良格人之地至黑海、里海。

上述前五条道路，显示中世纪早期由法兰克直接可至的地区未超出北非、阿拉伯帝国与拜占庭。虽然第六条道路可至黑海、里海，但是拉唐犹太商人远未涉足北欧地区，不可能经从此道。9世纪查理曼大帝（742—814）征服萨克森、巴伐利亚地区之后，大量法兰克犹太人迁徙至马格德堡、梅泽与雷根斯堡，并深入斯拉夫之地、波西米亚、摩拉维亚等地获取斯拉夫奴隶，也有犹太人直接从罗纳河行至日耳曼、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经营奴隶贸易<sup>[1]</sup>，但这些奴隶多被运到凡尔登、威尼斯、热那亚与比萨等地销售，并未继续朝向东方<sup>[2]</sup>。

迄今所知，中世纪早期犹太商人在东方的贸易也未超出上述地区，如查理曼曾命令一位在巴勒斯坦贸易的犹太商人，将一只老鼠高价卖给美因兹主教瑞彻夫（Richulf）<sup>[3]</sup>；公元797年又派遣犹太人艾萨克作为使团翻译官，前往巴格达朝见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hid, 764—809）<sup>[4]</sup>——这是迄今所知此时法兰克犹太商人所至最远之地。古代使节、朝圣者出行多凭借商人引导，搭载商人船只或与其同行，甚至不乏商人充当使节，法兰克使节、朝圣者的行程也应为法兰克商人长途贸易所及之处。

唐代中国与法兰克也没有直接联系，汉籍从未提及西欧。天宝十载（751）

[1] L. Rabinowitz, *Jewish Merchant Adventures: a Study of the Radanites*, pp. 23-24.

[2] J. H. Johnston, "The Mohammedan Slave Trade", in 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Vol. 13, 1928, p. 484.

[3] Solomon Katz, *The Jews in the Visigothic and Frankish Kingdoms of Spain and Gaul*, p. 130.

[4] Werner Keller, *Diaspora, The Post-Biblical History of the Jews*, Harcourt, 1966, pp. 158-159.

杜环在怛罗斯之战中被阿拉伯人俘获，曾到阿拉伯诸地，在《经行记》中记载了唐代国人所知最远的西方地区，其言：

拂菻国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又云摩邻国在秋萨罗国西南……行二千里至其国。<sup>[1]</sup>

其中拂菻指拜占庭，西海指地中海，南海即红海或印度洋，摩邻为Maghreb转音，即马格里布地区。秋萨罗，夏德认为是耶路撒冷转音；张星烺认为是西班牙国古名Castilla（卡斯提尔）音译<sup>[2]</sup>。据地理位置判断，大部分马格里布地区位于卡斯提尔东南部，与“摩邻西南”并不符合，且较之Castilla而言，秋萨罗与耶路撒冷发音更为相近，故秋萨罗为耶路撒冷更符合杜环记载。因此，唐代国人所知西方最远之地未超出阿拉伯世界，法兰克更是无从谈及。这与中西方贸易交往亦相契合：唐代汉籍中除了记载拜占庭、阿拉伯等多次遣使贡奉与大食人、波斯人之外，再未提及更远的西方地区<sup>[3]</sup>。

因此，就中世纪早期法兰克犹太商人贸易状态与范围以及中西方交通而言，法兰克犹太商人贸易应未超出北非、阿拉伯与拜占庭等地，并不具备远行至印度、中亚，乃至中国长途贸易的条件，德·胡耶与戈伊泰因等学者的主张显然是主观臆断，难免有欧洲中心论之嫌。

### 三、拉唐犹太商人与塞瓦杜拉唐之地

前述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将拉唐记作Rādhānites，伊本·法基赫记作Rāhdānīs。据读音与书写规则判断，Rādhānites与Rāhdānīs的核心词为Rādhān。在阿拉伯文献中，Rādhān一词作为地名多次出现，如阿拉伯史学家泰伯里（Tabari）《历代先知与诸王史》中记载：“817年马哈迪叛乱，控制了拉唐尼亚（Rādhānayn）地区。”<sup>[4]</sup>其中Rādhānayn即指Rādhān，为复数或双数写法。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中对拉唐之地有专门记载，称：

塞瓦杜（Al-Sawād）过去萨珊波斯王朝称为迪勒—伊朗舍赫尔（Dir

[1]（唐）杜环著，张一纯笺注：《经行记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2—19页。

[2] [德]夏德：《大秦国全录》，朱杰勤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50页；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13页。

[3]（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13—5317页；（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九七〇—九七六，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395—11471页。

[4] Al-Tabari, *The History of al-Tabari*, Vol. XXXII,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p. 67.

Iranshahr)，是伊拉克中央省，内辖12个区，这些区分成60个县。在底格里斯河与塔麦拉河流域东侧有以下诸县：其中沙泽·忽尔木兹区有7个县，包括Rādhān al-A'īlā与Rādhān al-Asfal，Al-Rādhānayn县有16个集镇。<sup>[1]</sup>

Al-Sawād在阿拉伯与波斯语中意为黑土，指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在今伊拉克南部形成的冲积平原，代表富庶可耕之地。萨珊波斯时期，塞瓦杜演变为指代古伊拉克的政治区域，即Dir Iranshahr，意为中央伊朗城；阿拉伯帝国时期，此政治区域仍被沿用<sup>[2]</sup>。Rādhān al-A'īlā即上Rādhān、Rādhān al-Asfal即下Rādhān，Al-Rādhānayn即Rādhān的复数形式，包括上、下Rādhān<sup>[3]</sup>。

比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稍晚的艾卜·法尔吉·古达玛（Abu al-Fari Qudamah）在《税册及其编写》中也记载了拉唐之地，称：

塞瓦杜原有60个县，后被划出12个县……现在管辖有10个区和下属48个县……其中沙兹·古巴兹区辖7县，包括Rādhān al-A'īlā与Rādhān al-Suflā诸县……塞瓦杜各地税收，其中Al-Rādhānayn 4,800库尔小麦……<sup>[4]</sup>

据以上记载，可知拉唐之地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塞瓦杜地区，为该地所辖两县，总称拉唐尼亚。萨珊波斯与阿拉伯帝国时期，塞瓦杜作为帝国统治中心，地位显赫，拉唐尼亚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摩西·吉尔曾对拉唐尼亚具体地望有所考证，称该地北界为巴特（Batt）运河<sup>[5]</sup>、南部为居卡（Jūkhā），现在巴格达城东部就是曾经拉唐尼亚的核心地带，主要包括马侯泽（Māhōzē）、哈勒（Hālē）、居卡与纳赫万（Nahrwān）等地，设有卡迪（Qadi）与州长管理<sup>[6]</sup>。

巴比伦地区犹太人历史悠久，公元前6世纪新巴比伦王国就将犹太王国中的犹太祭司、王室成员与大量犹太人掠往巴比伦地区；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占领巴勒斯坦地区，并于公元70年征服耶路撒冷、摧毁犹太人第二圣殿，大量

[1] [阿拉伯]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第5—12页。

[2] C. E. Bosworth, E. Van Donzel, W. P. Heinrichs,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Brill, 1997, Vol. IX, p. 87.

[3] [阿拉伯]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第5页以及注释④。

[4] [阿拉伯] 艾卜·法尔吉·古达玛：《税册及其编写》，载[阿拉伯]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第249—253页。

[5] 巴特运河位于今尤苏非亚（Al Yusufiyah，位于今巴格达南部近郊）附近地区。

[6] 卡迪为伊斯兰教法官，负责当地仲裁以及审判事务，详见Moshe Gil, “The Rādhānite and the Land of Rādhān”, pp. 314-323.

犹太人再次涌入巴比伦地区。帕提亚时期（前247—前224），大量犹太人已生活在巴格达、内哈德（Nehardea）、尼斯比斯（Nisibis）、马侯泽、普穆贝迪塔（Pumbaditha）、苏拉（Sūrā）、马褚扎（Machuza）、泰西封与阿达什芮斯（Ardashiris）等地，成为一支最大的流散犹太人群体<sup>[1]</sup>。此时，巴比伦犹太人影响力日益提高，取代巴勒斯坦犹太人地位，巴比伦犹太人流散宗主（Exilarch, גלות ראש）成为公认的犹太人首领<sup>[2]</sup>。

阿拉伯时期，巴比伦犹太人因协助穆斯林攻城有功，被赋予更多自治权，犹太宗主影响力日益扩大。穆斯林统治时期第一位流散宗主博茨塔那·本·哈尼纳（Bostanai B. Haninay）在阿拉伯王廷享有盛誉，其家族连续三个世纪都担任流散宗主<sup>[3]</sup>。12世纪，周游欧亚各地的西班牙图德拉（Tudela）犹太人拉比本杰明（Benjamin）行至巴格达时，就为流散宗主的权威深感惊叹，称：

流散宗主享有极高的威望与权力，影响力波及甚广，远至印度，众多犹太群体接受其权威。没有其许可，任何人不得私自在犹太会堂进行人事任命及决策。他在巴格达进行全权管理，并接受各地馈赠。<sup>[4]</sup>

除巴格达之外，此时犹太人形成了三大分布区域，主要包括西北部费如兹·萨布尔、内哈德、普穆贝迪塔、苏拉与底格里斯河东岸马侯泽、泰西封与塞琉科亚等地<sup>[5]</sup>，这些地区犹太人规模远盛巴格达，本杰明即称：“巴格达地区共有28座犹太会堂，但大部分位于巴格达城郊。”<sup>[6]</sup>拉唐尼亚地辖马侯泽、哈勒、居卡与纳赫万等地，其地早在帕提亚时就有犹太人分布，阿拉伯时期已成为底格里斯河东岸重要的犹太人群体。从拉唐地区纳赫万通过巴特运河即可至

[1] 内哈德位于巴格达西北；尼斯比斯即今土耳其南部边境努赛宾；普穆贝迪塔位于巴格达附近；苏拉位于巴格达南部；马褚扎，巴比伦古城；阿达什芮斯位于今伊朗德黑兰附近。关于帕西亚时期以上诸地犹太人情况，详见H. H. Ben-Sasson, *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p. 375。

[2] Exilarch源自希伯来语גלות ראש，意为流散宗主，指巴比伦之囚与犹太王国被罗马征服之后流亡到巴比伦的犹太人群体首领。流散宗主2世纪被首次提及，一直存在至11世纪，之后偶尔也有犹太人被称为流散宗主。

[3] Norman A. Still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30.

[4] Rabbi Benjamin, *Travels of Rabbi Benjamin*, trans. B. Gerrans, London, 1840, pp. 94-103.

[5] Moshe Gil, “The Rādhānite and the Land of Rādhān”, pp. 322-323, Note. 116.

[6] Rabbi Benjamin, *Travels of Rabbi Benjamin*, Rev. B. Gerrans, p. 103.

巴格达<sup>[1]</sup>，因此两地犹太人联系十分密切，拉唐尼亚犹太人颇受流散宗主影响。戈伊泰因甚至认为，流散宗主即出自底格里斯河东岸犹太人群体<sup>[2]</sup>。如其说不误，则不排除犹太宗主由拉唐尼亚犹太人担任的可能。

但可以确信的是拉唐尼亚犹太人在宗教与学术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帕提亚时期，犹太人耶希瓦（Yeshiva）已在巴比伦地区出现——Yeshiva即希伯来语ישיבה，原意为“坐下”，演变为指古代学习、研究传统犹太教经典、《塔木德》与犹太律法的犹太人学校。公元219年，阿巴·阿里卡（Abba Arikha）在苏拉建立耶希瓦；不久之后，塞缪尔（Samuel）在内哈德建立耶希瓦，拉比犹大·巴·以西结（Judah bar Ezekiel）又在普穆贝迪塔建立耶希瓦。苏拉与普穆贝迪塔耶希瓦成为巴比伦犹太宗教学术中心，其主事者为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宗教学者。6世纪后，苏拉与普穆贝迪塔耶希瓦主事者被称为格昂尼姆（Geonim）——Geonim即希伯来语גאונים，单数形式为גאון，即Geon，为荣耀、天才之意，之后专指6—11世纪苏拉与普穆贝迪塔耶希瓦主事者。格昂尼姆被视为流散犹太人宗教领袖，对《托拉》与犹太律法具有最权威的解释，并通过答问（Responsa）回答各地犹太人问题，规范犹太人的宗教生活<sup>[3]</sup>。中世纪时期，拉唐尼亚犹太人就曾担任格昂尼姆，如788—796年间居卡的马尔·瑞·梅纳什（Mar Rāv Menashē）被选任为普穆贝迪塔耶希瓦格昂；796—798年间基瓦德（Kilwādhā）的马尔·瑞·以赛亚（Mar Rāv Isaiah）又继任格昂（摩西·吉尔认为基瓦德位于底格里斯河以东地区，属于拉唐尼亚地界）<sup>[4]</sup>。据拉唐尼亚犹太人流散历史、分布范围及影响判断，此地犹太人规模较为庞大，且颇具势力。

古代阿拉伯人常以地名称人名，乃为惯例。南宋泉州市舶提举赵汝适《诸蕃志》中记载一位来泉州贸易的阿拉伯商人施那围，称：

有蕃商曰施那围，大食也，侨寓泉南。作丛冢于城外东南隅，以掩胡

[1] Yāqut, *Mu'jam*, I, 410, 510, III, 12-13, V, 318, in Al-Tabari, *The History of al-Tabari*, p. 67, note. 214.

[2] Goitein, *Proceed, 5th World Congr. of J. St.*, II, 1969, 109 ff. in Moshe Gil, “The Rādhānite and the Land of Rādhān”, pp. 322-323, note. 116.

[3] 欧亚各地犹太人经常致信格昂尼姆咨询犹太律法与宗教等问题，格昂尼姆解释后并寄送，故称答问。

[4] Moshe Gil, “The Babylonian Encounter and the Exilarchic House in the Light of Cairo Documents and Parallel Arab Sources”, in Noman Golb, *Judaeo-Arabic Studies*,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p. 154.

贾之遗骸。<sup>[1]</sup>

古代汉语r与n、f与v在发音上混同，施那围之名与波斯湾头著名的贸易港口Sīrāf（尸罗夫）同音。9—12世纪上半叶，尸罗夫一直作为波斯湾最大的贸易港口，阿拉伯商人常从此港出海贸易，阿拉伯商人施那围之名明显出自Sīrāf。

拉唐尼亚地处塞瓦杜，由其地至法兰克、北非、拜占庭、中亚、印度与中国等地的海陆交通十分便利。其地犹太人应是常年到欧亚诸地贸易，自然被掌管邮驿与情报的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知，并以地名称人名的方式将其记之为拉唐犹太商人。以其所讲众多语言判断，拉唐犹太商人应是分成各个批次前往不同地区，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应是将不同的拉唐犹太商人群体综合起来从西方叙述至东方，方才有此种历史图景。

#### 四、拉唐犹太商人入华

拉唐犹太商人是迄今所知最早见于文献记载入华的犹太人，国内外学界对拉唐犹太商人入华的研究鲜见深入，较为薄弱。拉比诺维茨曾在专著《犹太商人历险：拉唐研究》中对拉唐犹太商人入华有所探讨<sup>[2]</sup>，但其关于拉唐犹太商人的入华路线研究仍有错误，最为不足的是多集中于拉唐犹太商人篇章，没有将之与其他文献，尤其是汉文文献进行互证，未能完全揭示拉唐犹太商人入华信息，也未以此探析唐代犹太人入华状态，故有必要对该问题重新探讨。

##### （一）拉唐犹太商人海路入华

拉唐犹太商人海路入华凡有两道：一道经法兰克、凡莱玛、古勒祖姆、达伽尔、吉达至信德、印度及中国；另一道从法兰克、安条克、伽比亚、巴格达、乌布拉、阿曼至信德、印度及中国，即分别从红海与波斯湾经印度洋入华。中世纪阿拉伯统治时期红海与波斯湾联系便利，故拉唐犹太商人入华实则为经印度洋至东方之一道航线。

由波斯湾、红海至中国的航线早已形成，迄今所知关于此航线的记载首见于9世纪中叶入华阿拉伯商人苏莱曼（Sulayman）《中国印度见闻录》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其中苏莱曼记载：

[1]（南宋）赵汝适撰，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47页。

[2] L. Rabinowitz, *Jewish Merchant Adventures: a Study of the Radanites*.

从巴士拉、阿曼、尸罗夫前往印度故临<sup>[1]</sup>，驶往孟加拉海至朗迦鲁斯岛<sup>[2]</sup>、箇罗国（马来半岛）……到达奔陀浪山、占婆，行至占不牢山，穿过中国之门向涨海前进，至中国广州。<sup>[3]</sup>

苏莱曼所记即从巴士拉出发经波斯湾诸地至印度西海岸，再经孟加拉海至箇罗，经马六甲北上至占婆、占不牢山过南海抵广州，与唐代贾耽所记广州通海夷道道同，仅是航向相反<sup>[4]</sup>，显示此道同时被阿拉伯人与国人熟知，常年生活在波斯湾头的拉唐犹太人自然对此非常了解并经此道入华。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载：

从巴士拉至霍尔木兹、穆拉，经塞兰迪布（锡兰）至凯莱赫岛（箇罗）、加巴岛（爪哇）、香料国国（马鲁古群岛）、玛仪特（菲律宾麻逸），左行至占婆至中国第一个港口鲁金，再至广州。<sup>[5]</sup>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记从巴士拉到箇罗航线与苏莱曼相同，但从箇罗前往中国航线则继续东行至爪哇、香料群岛，再北上左行至占婆，由此入华。唐代汉籍没有关于从香料群岛入华海路的记载，但却记载唐高宗总章二年（669）浞泥（加里曼丹岛）遣使来华<sup>[6]</sup>，故唐代从香料群岛入华海路就已通达。虽然此道鲜为国人所知，但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载表明阿拉伯商人知晓此道，因此拉唐犹太商人也可经此道入华。

10世纪初阿拉伯人阿布·赛义德曾记载：“回历264年（877年9月—878年9月）黄巢攻破广州，屠杀居民，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总共有十二万人被杀害。”10世纪阿拉伯史地学家马苏第（Al-Masudi）记有二十万人被杀害<sup>[7]</sup>。尽管所记人数有所不同，但9世纪应

[1] 故临位于印度西海岸。

[2] 此地即婆鲁斯洲，位于尼科巴群岛。

[3] [阿拉伯] 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一，穆根来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9页。

[4]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第1153、1154页。

[5] 穆拉位于印度西海岸；鲁金即今越南北部龙编，唐廷设安南都护府管交州地。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记海路，详见[阿拉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第64—72页。

[6] （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二三《外国》，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378页。

[7] [阿拉伯] 阿布·萨义德：《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日] 藤本胜次译注、黄倬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6页；[阿拉伯] 马苏第：《黄金草原》，耿昇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66页。

有大量犹太人在广州贸易，此便证实拉唐犹太商人入华的真实性，广州犹太人中肯定包括拉唐犹太商人。在拉唐犹太商人入华海路所经凡莱玛、古勒祖姆<sup>[1]</sup>、安条克、伽比亚、巴格达、乌布拉，乃至印度、锡兰等地此时都有大量犹太人分布，阿布·赛义德提到锡兰岛上居住着为数众多的犹太教徒，锡兰王准许他们遵从自己的祭祀<sup>[2]</sup>；图德拉的本杰明记载锡兰犹太人有3000余名之多<sup>[3]</sup>。波斯湾地区巴士拉、尸罗夫、基什岛、卡提法岛等地也有大量犹太人<sup>[4]</sup>。中世纪波斯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印度人、非洲人及各地商人云集尸罗夫，10世纪上半叶犹太人鲁兹巴赫（Ruzbah）曾担任尸罗夫港主，负责贸易事宜。拉唐犹太商人选择途经这些地区，定是与这些地区的犹太人有贸易往来，这些地区的犹太人，尤其是紧邻红海、波斯湾以及印度、锡兰等交通便利地区的犹太人也有可能与拉唐犹太商人一道涉足印度洋贸易，甚至入华。

## （二）拉唐犹太商人陆路南道入华

此道从西班牙、法兰克至北非苏斯·阿克萨、丹吉尔、凯鲁万、埃及首都，然后至拉姆拉、大马士革、库法、巴格达、巴士拉，经阿瓦士、法尔斯、克尔曼到达信德、印度，最终至中国，其中埃及首都为福斯塔特（Fustat）城：公元641年阿拉伯人占领埃及后建立都城福斯塔特；969年法蒂玛王朝在福斯塔特城北部营建开罗，开罗成为埃及新的首都。

公元711年倭马亚王朝吞并印度信德，建立从巴格达途经阿瓦士、法尔斯与克尔曼等地通往信德的驿道，拉唐犹太商人可经此道到达信德。唐代印度至中国陆路交通在道宣《释迦方志》中记载尤详，其记：“依大唐往年使者，则有三道。”<sup>[5]</sup>东道从青海、吐谷浑、白兰羌等地经吐蕃、尼泊尔到达印度<sup>[6]</sup>；中道从鄯善、于阗经今阿富汗入印<sup>[7]</sup>，即裴矩《西域图记》所记丝绸之路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忸延、漕

[1] Norman Golb, “The Topography of the Jews of Medieval Egypt”, in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33, pp. 116-149.

[2] [阿拉伯] 阿布·赛义德：《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第124页。

[3] Rabbi Benjamin, *Travels of Rabbi Benjamin*, Rev. B. Gerrans, p. 140.

[4] 基什岛为波斯湾中一座岛屿，位于伊朗南部；卡提法，波斯湾地区岛屿。以上诸地犹太人分布情况，详见 Rabbi Benjamin, *Travels of Rabbi Benjamin*, Rev. Marcus Nathan Adler, London, 1907, pp. 45—64.

[5][6][7]（唐）道宣撰，范祥雍点校：《释迦方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20页。

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sup>[1]</sup>北道从高昌、焉耆等地度葱岭，经河中地区、今阿富汗入印<sup>[2]</sup>。道宣所记三道来往僧侣、使节众多。贞观十七年至显庆二年（643—657）王玄策三次入印，永徽年间（650—655）新罗人玄太法师入印，高僧玄照、道生从印归程等皆取东道；玄奘从印归程则取中道；玄奘、质多跋摩、隆、信胄等高僧入印皆经北道<sup>[3]</sup>。因此当拉唐犹太商人到达印度时，对此三道应不陌生，并由此入华。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曾记载拉唐犹太商人从中国带回麝香。众所周知，吐蕃麝香最为名贵，阿拉伯史家雅库比（al-Yaqubi）即称：“最好的麝香是吐蕃麝香，其次是粟特，再其次是广州。”10世纪阿拉伯史家伊本·穆哈利尔（Ibn Muhalhil）曾记载“吐蕃城中有伊斯兰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与祆教徒”<sup>[4]</sup>，显示犹太人已深入至吐蕃贸易。公元953年阿拉伯人巴佐尔·本·萨赫里亚尔（Buzurg ibn Shahriyar）曾提及：“阿曼犹太商人艾萨克从海路前往中国贸易途中曾来到喜马拉雅山一个名为Lh6（Lubin）的地区，在王庭上展示了一颗璀璨的珍珠，国王与王后为之心动，花大价购买。艾萨克通过向这里的王公贵族供应珍珠富甲一方。”<sup>[5]</sup>古代吐蕃常称不丹为“

与海路入华贸易类似，拉唐犹太商人所经此道大部分地区有犹太人流散。<sup>7</sup>

[1]（唐）魏徵《隋书》卷六七《裴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79、1580页。

[2]《释迦方志》，第20—27页。

[3]《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第5307、5308页；（唐）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0、43、61、66、86页；（唐）慧立、彦惊著，孙毓棠、谢芳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40、113—125页。

[4]雅库比与伊本·穆哈利尔的记载，详见〔法〕费瑯编：《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上册，耿昇、穆根来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7、233页。

[5]Jacob R. Marcus, *The Jews in the Medieval World, A Source Book: 315-1791*, New York, 1981, p. 358.

[6]杨刚基：《不丹考释》，《西藏研究》1991年第4期，第153、154页。

世纪倭马亚王朝时期命令埃及总督将一千余户犹太人迁至凯鲁万，9世纪此地已成为犹太人学术中心<sup>[1]</sup>；图德拉的本杰明提及福斯塔特大约有7000余名犹太人，巴格达、大马士革、库法、巴士拉及周边的西顿、提尔、阿勒颇、摩苏尔等地也有大量犹太人聚居。中世纪这些地区犹太人从事玻璃制造、工匠、染织等行业，尤其是提尔犹太人制造玻璃的工艺尤为精湛，这些物资多用于贸易<sup>[2]</sup>。拉唐犹太商人选择途经这些地区，显示其应与这些地区的犹太人有贸易交往，同样不排除诸如巴格达、大马士革、库法、巴士拉等地犹太人与拉唐犹太人一起入华贸易之可能。

### （三）拉唐犹太商人陆路北道入华

此道从罗马北部经斯拉夫之地至可萨、里海，最后经巴里黑、河中地区与九姓乌古斯入华。拉比诺维茨认为北道的罗马为意大利罗马城，并称拉唐犹太商人从罗马城北上经萨克森、巴伐利亚等地至斯拉夫，再由此至可萨等东方诸地<sup>[3]</sup>。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中关于罗马的记载皆以罗马指拜占庭帝国，而非意大利罗马城，如在“罗马诸位执政官”中记载：

罗马国最巨大的城市是他们的堡垒，即君士坦丁堡……罗马诸王在此建立了温泉建筑。<sup>[4]</sup>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将意大利记为鲁密亚（Rūmīya）（“罗马的”或“罗马城”之意），将意大利罗马记为罗马城，其记：

鲁密亚东方、南方、西方皆临海洋，仅有北方通大陆……罗马城中有一座教堂以圣彼得与圣保罗之名建造……罗马城中有1200座教堂……<sup>[5]</sup>

鲁密亚东方、南方与西方皆临海洋，北方通大陆，显然为亚平宁半岛地理面貌，应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将意大利与罗马城混淆，则称意大利罗马为“罗马城”，而非“罗马”。对比前述罗马诸位执政官，可知在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心目中，罗马城仅指意大利罗马，罗马则指罗马帝国，即拜占庭。

即使将北道罗马理解为意大利罗马城，也与此时代法兰克犹太人贸易状态不

[1] L. Rabinowitz, *Jewish Merchant Adventures: a Study of the Radanites*, p. 38.

[2] Rabbi Benjamin, *Travels of Rabbi Benjamin*, pp. 69-71, n. 4, pp. 15-58.

[3] L. Rabinowitz, *Jewish Merchant Adventures: a Study of the Radanites*, pp. 139-144.

[4][5] [阿拉伯]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第115—117、121、122页。

符，前述法兰克犹太商人并未沿斯拉夫之地继续朝向东方贸易。因此，北道的罗马应确指拜占庭帝国。

萨珊波斯时期，拜占庭无力打破波斯对丝绸贸易的垄断，遂与波斯互设贸易榷场<sup>[1]</sup>。阿拉伯时期，从波斯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更为便利，从波斯境内埃克巴塔纳、哈马丹，经尼斯比斯、萨摩萨塔，或从刺吉思经阿尔塔沙特、杜比沃斯、沙他拉皆可到达安纳托利亚，甚至深入拜占庭以北地区<sup>[2]</sup>。因此，拉唐犹太商人从拉唐尼亚经行至拜占庭及其北部地区当为便利。

拜占庭北部经斯拉夫之地至里海之道早在6世纪就已形成。6世纪中叶，西突厥粟特人与拜占庭为打破波斯人对丝绸贸易的垄断，互派使团、建立联盟，双方使团即经从此道。据拜占庭史学家弥南德（Menander）记载，拜占庭使者蔡马库斯与瓦伦丁往返的道路，即大致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先至黑海地区，再经高加索至里海，最终到达西突厥汗庭<sup>[3]</sup>。6世纪中叶此道开通后便成为拜占庭与东方诸地联系的交通孔道，裴矩《西域图记》对此有所记载，且记经由此道可入华，其记：

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sup>[4]</sup>

裴矩所记从伊吾出发，经天山北麓至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到达突厥可汗庭——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时曾移庭于千泉，突厥可汗庭应为千泉地区<sup>[5]</sup>。从突厥可汗庭千泉至拜占庭道路，裴矩记载仅记度北流河水，弥南德所记从拜占庭通西突厥之道可补其不足。因此，拉唐犹太人可从拜占庭北部经此道先到达里海地区。

具体而言，拉唐犹太人从拜占庭北部出发到达黑海地区，且有可能途经特拉比宗城，因为该城在中世纪为黑海地区贸易要地，马苏第即记载：

[1] 张绪山：《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1、32页。

[2] 埃克巴塔纳位于今伊朗西部，与哈马丹紧邻；萨摩萨塔位于今土耳其南部。杜比沃斯位于阿尔塔沙特以北；沙他拉位于今土耳其。阿拉伯时期波斯通拜占庭之道，详见〔英〕G. F. 赫德逊：《欧洲与中国》，王遵仲等译，何兆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91、92页。

[3] 详见〔英〕裕尔撰，〔法〕考迪埃修订：《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67—180页。

[4] 《隋书》卷六七《裴矩传》，第1579页。

[5] 千泉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山脉地区。

特拉布松城（特拉比宗城）就位于该海（黑海），每年都要举行数次交易会，大量穆斯林、拜占庭人、亚美尼亚人和其他民族商人经常去参加。<sup>[1]</sup>

此处所记其他民族商人应包括犹太商人，前往东方贸易的拉唐犹太商人自然不会错过特拉比宗，然后再前往高加索。6世纪斯拉夫人就遍布在黑海与里海之间的高加索地区，并经常贸易，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载：“斯拉夫人将毛皮、刀剑等从斯拉夫边远地区带到罗马海（黑海）……再行至可萨、里海。”<sup>[2]</sup>因此，拉唐犹太商人途经此地应是与斯拉夫商人贸易。

拉唐犹太商人离开斯拉夫之地后前往可萨。一般认为可萨人是一支西迁的铁勒部族，活动在黑海、高加索与里海北部地区<sup>[3]</sup>。6世纪末可萨被西突厥吞并，被称为可萨突厥、突厥可萨部<sup>[4]</sup>；公元657年西突厥灭亡，可萨在高加索一带崛起，成为拜占庭通往中国道路的必经之地，直到965年被罗斯人灭亡。9世纪初可萨改宗犹太教，成为中世纪唯一信奉犹太教的国家，马苏第记载：“可萨国王、宫廷及所有像他们那样的可萨人都信仰犹太教，可萨国王在哈里发哈伦·赖希德（764—809）时期受皈依信仰犹太教。……可萨在改宗犹太教之后成为欧亚诸地犹太人避难所与向往之地，许多犹太人从伊斯兰城市和拜占庭迁往可萨……大量犹太人争相逃离罗马地区。”<sup>[5]</sup>此时拉唐犹太商人选择途经可萨，定与当地犹太人贸易有着密切关系。

拜占庭至中国北道贸易路线在6世纪中叶被开通后，可萨便成为此道入华的必经之地。1973—1974年在北高加索西部库班河（Kouban）上游地区发掘的莫谢瓦亚·巴尔卡及其东部墓葬群中出土了大量8—9世纪中国丝绢、汉文文书及唐人骑马图等绢画等<sup>[6]</sup>，显示此时可萨与中国有大规模贸易往来。与拉唐犹太商人相比，可萨犹太人应更早知晓此道，甚至很早便经此道入华贸易，由此显示9世纪以可萨为中心在北道形成了一条沟通中国与西方的犹太人贸易之路。

[1] [阿拉伯] 马苏第：《黄金草原》，第212页。

[2] [阿拉伯]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第165页。

[3] Kevin A. Brook, *The Jews of Khazari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 p. 12.

[4] 《经行记笺注》，第17、63页。

[5] [阿拉伯] 马苏第：《黄金草原》，第214页。

[6] 详见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和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6—22页。

拉唐犹太商人离开可萨后，经里海南下到达巴里黑（今阿富汗北部巴尔赫）与河中地区。9世纪中叶，巴里黑、河中地区属于阿拉伯帝国呼罗珊地区管辖。呼罗珊地区犹太人历史悠久，据阿拉伯史家泰伯里、雅古特（Yāqut）记载，麦穆尼、喀布尔、坎大哈、木鹿、尼沙布尔等地有大量犹太人聚集区<sup>[1]</sup>。巴里黑一座城门就被称为Bab al-Yahud，即犹太之门<sup>[2]</sup>；河中地区犹太人分布在塔什干、布哈拉、撒马尔罕与费尔干纳诸地，图德拉的本杰明提及撒马尔罕约有5万余名犹太人<sup>[3]</sup>。

古代长途贸易耗费繁多，且易受各种不稳定因素影响，若计于安全便利以及经济利益考虑，拉唐犹太商人到达可萨时最应选择裴矩所记北道入华，但他们却选择南下经巴里黑、河中地区，并未遵循便利的道路，唯一能够解释此种行程的原因只能是与这些地区的犹太群体有关。唐代巴里黑、河中地区与中原王朝交往甚密，尤其是河中地区粟特人经常入华贸易，拉唐犹太商人辗转来到这些地区，定与巴里黑、河中地区犹太人贸易有关，甚至不排除与这些地区犹太人共同入华贸易。

最后，拉唐犹太商人经河中地区至九姓乌古斯驻地。回鹘建立后，历经十姓回鹘与九姓乌古斯统治，后因唐廷镇压转至漠北。8世纪九姓乌古斯迁至东部天山地区（包括西天山北麓伊塞克湖以东及北部伊犁河上游地区），《道里邦国志》所记Toghuzghuz应指这批回鹘。同时代阿拉伯作家艾卜·法尔吉·古达玛记载：“土胡兹胡尔（Toghuzghuz）城有一湖泊。此城有12座铁门，由突厥人把守。”<sup>[4]</sup>土胡兹胡尔城应为回鹘都城，即九姓乌古斯驻地，该城所毗邻的湖泊应为九姓乌古斯辖地伊塞克湖，即汉籍所记热海、大清池<sup>[5]</sup>。因此拉唐犹太商人从河中地区到达天山东部土胡兹胡尔城后，沿天山北麓经伊塞克湖一带入华。

1901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于阗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一封犹太—波斯文（Judeo-Persian）信件<sup>[6]</sup>。此信系一位8世纪在丹丹乌里克贸易的泰伯里斯坦

[1] C. E. Bosworth, “The Early Islamic History of Ghur”, i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961, Vol. 6, pp. 116-133.

[2] L. Rabinowitz, *Jewish Merchant Adventures: a Study of the Radanites*, p. 146.

[3] Rabbi Benjamin, *Travels of Rabbi Benjamin*, Rev. B. Gerrans, pp. 124、125.

[4] [阿拉伯] 艾卜·法尔吉·古达玛：《税册及其编写》，第278、279页。

[5] 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第1508页。

[6] 犹太—波斯语指以希伯来字母书写的波斯语，详见Dariush Gitsetan, “Judeo-Per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MELA Notes*, 1983, pp. 13-14.

(Tabaristan)犹太商人写给其雇主,因战乱未被发出,现存大英博物馆<sup>[1]</sup>。1908年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一封希伯来文祈祷文,现存巴黎国家图书馆,波拉克(M.Pollak)考证其为8—9世纪敦煌犹太人遗物<sup>[2]</sup>。唐代于阗、敦煌皆为丝绸之路贸易重镇,丝绸之路更是“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sup>[3]</sup>。这两份考古发现显示唐代犹太人已云集于阗、敦煌,甚至长期驻守,形成犹太人贸易聚集区,同时也证实《道里邦国志》所记拉唐犹太商人入华的真实性,于阗、敦煌等地应有拉唐犹太人的身影。拉唐犹太人陆路北道入华途经可萨、巴里黑与河中地区,清楚地表明他们在入华途中特意途经犹太人聚集区,愈加证明了前述对于其海路与陆路南道入华的设想,说明此时欧亚诸地犹太人已形成完备的海路与陆路贸易往来,建立了犹太人贸易之网,甚至共同操持入华贸易,拉唐犹太商人应是继承了犹太人入华贸易传统,仅是其中代表之一。

## 五、结 语

关于古代犹太人入华的文献与考古资料极为稀少,因此犹太人在丝绸之路中的作用常被忽视,学者们常多关注并突出阿拉伯人、波斯人与粟特人等,但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所记拉唐犹太商人为我们了解丝绸之路上的犹太商人提供了难得的文献资料。通过对拉唐犹太商人篇章的考证,显示唐代欧亚诸地犹太人已经建立了一个犹太人贸易之网,沟通了中国、阿拉伯帝国、印度、中亚与西方诸地的贸易交流,并在广州、于阗与敦煌等地形成了犹太人贸易聚集区。因此,犹太人在唐代中外交流中的作用与历史地位应被重新审视。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 泰伯里斯坦位于里海南岸,相当于今伊朗马赞德兰省、吉兰省、戈勒斯坦及塞姆南省部分地区。关于对此封信件的考证,详见李大伟:《丹丹乌里克犹太—波斯文信件考释》,《敦煌研究》2016年第1期,第102—110页。

[2] M. Pollak, *Mandarins, Jews and Missionaries,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the Chinese Empire*, Philadelphia, 1980, p. 260.

[3] 《隋书》卷六七《裴矩传》,第1580页。